

学术自传

传记研究：我终生的事业

——写给青年朋友的学术自传

三十多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学习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的时候，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有许多天分甚高，也非常勤奋的人物，为自己的研究几乎是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但是他们的成果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也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

比如欧洲中世纪的绝大多数学者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一切学问都在《圣经》之中”，把一切学科都变成神学的婢女，成为对《圣经》的注释。他们对《圣经》中的某句话、某个细节，进行无数繁琐的注疏、考证，或是引申为经院哲学的问题。他们的那些手稿，至今还保存在欧洲一些古老的图书馆里，那密密麻麻、一丝不苟的文字向参观者诉说着主人的辛劳，但是却摆脱不了蛛网尘封的宿命，只能作为一件古董而存在，没人关心其内容。连篇累牍讨论“把猪牵到市场去的是手还是绳子”这类问题的论文，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我也发现，我见过的一些人物有同样的命运。我童年时代见过父亲的塾师，人人都尊称他“大太爷”，是个秀才，家乡著名的博学人物，据说他每天五更必定起床读书，几十年如一日；他骑着毛驴赴京赶考，路上几个月不停地背书，能把“十三经”一字不差地背完。我在南大图书馆把他的一部著作

找了出来,看到其内容是把中国史上的大事编成四字一句供学童背诵,这样的启蒙读物有其用处,但类似的读本已有很多,我真为他那满肚子学问惋惜。还有一位比我年长的同事,他多少年中只做一件事:翻译和注释二十世纪初的一些英国通俗小说,这些小说其实并没有多大价值,也早已过时,其中又涉及许多背景资料,翻译起来并不容易。我忘不掉严冬季节,在没有火炉而又朝北的房间里,他戴着棉帽、放着护耳、裹着厚厚的棉大衣缩在一个角落,一边呵手,一边查字典的情景。这位先生执著于此,花费了多年时间,听说他译完了,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译稿。他的中英文都不错,我想他如果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就吧。

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勤奋固然是学业成功的前提;但是,勤奋并不一定就能成功。对一位学者来说,确定研究的方向至关重要,有些课题是注定做不出什么成果的。我很庆幸,我刚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中国第一批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的名单。这在大学,特别是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硕士生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博士生导师”,那时同“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一样,是非常尊贵的头衔,让人肃然起敬。我们都关注这个名单,我看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朱东润教授的大名就在其中。

朱先生的招生方向是“中国各体文学”中的传记文学,从此“传记”两个字牢牢吸引了我。说来好笑,我毕业于大学中文系,此后教过十年中学语文,少年时代也翻过家里的一部线装《史记》以及一些现代传记作品,但是对“传记”二字却很茫然。我的一些同事好像也差不多,记得一位朋友就对我说过:“你要研究传记,好啊,我也写过唐人传奇的文章,我们可以交流的。”

这些都验证了胡适的一句话:“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事实正是如此,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除了《史记》外,就好像没有提到过其他“传记”作品。外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流行的

几种西方文学史教材,也只说到罗马时代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十八世纪英国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好像再没有其他传记作品可谈。至于传记理论,更是少见,那时翻遍大学图书馆的中英目录,也没有查到几本。

带着疑惑,我进一步考查历史。我又发现,中国和西方国家不是没有传记,而是出现过大量传记作品,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纪传体,主体就是人物传记。此外广义的传记,诸如日记、书信、游记等等更是车载斗量。西方国家同样如此,传记作品很多,但是其中优秀传记太少,难以传世。

这种状况,到二十世纪初期开始逐步改观。首先是英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伍尔芙带头写过四部传记作品,而且对传记进行了研究,她写出的传记论文,奠定了现代西方传记理论的基础。此后传记迅速发展,传记作品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加,优秀作品也不断出现。1917年,美国著名的普利策奖就设立了“传记和自传奖”。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受到西方这一潮流的影响。胡适、郁达夫、茅盾、朱东润等人,他们都指出中国传记的落后,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关心传记、写作传记,并且身体力行带头写传记。尤其是胡适,显示出他作为新文学领袖人物的远见。在他的倡导之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诞生了,很快形成了一个高峰,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特别是自传,胡适、沈从文等人都写出了中国现代自传中的经典之作,新文学左翼的代表鲁迅和郭沫若也都写有大量自传类作品。但是由于战争、动乱等原因,这一高潮并没有延续多久。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中国现代传记逐步形成第二个高峰,每年出版的长篇传记从几十种攀升到几百种;九十年代达到几千种;近年来更是达到上万种,远远超过小说的年出一千多种。这一现象并不奇怪,文学是属于时代的,先秦是散文,其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文类。小说从明清延续下来,现在开始让位于传记了。美国《纽约时报》1996年在一篇专文中惊呼:

“现在是一个文学回忆录的时代。”文学回忆录是传记的一种形式,我同意一些学者的说法: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传记的时代。

传记热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探索愿望,传记的繁盛需要学术的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创新,要创新应当考虑两个因素:新材料和新方法。王国维说得好:“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古来新学问起,大都源于新材料。”在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学术的大发展就有赖于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卷轴、流沙简牍、宫廷档案等,有了这些材料,就有了学术发展的空间。

另一方面,除了新材料,还需要新方法,有了新方法才能有新视角,提出新问题,得到新发现。我很幸运,在我关注传记、决定从事传记研究的时候,不但传记正在进入高峰期,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而且新方法也出现了。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称之为方法论的年代,国外那些已经并不很新的方法和那些刚刚出现的新方法,比如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都被一一介绍到中国来,新的学科,特别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它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开始了复苏和发展。今天看来,那个时代虽然免不了幼稚,其中包含着种种偏激、肤浅、误解,但成就也是空前的。

我读研时的专业方向就是西方文论。我发现,西方文论新方法的引入,带来了传记研究革新的可能。长期以来把传记同小说靠拢,用小说的标准来评论传记,或是依靠一些传记家写下写作感受来指导传记,这种状况应当结束了,应当从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中汲取养料建立现代传记理论。这样,我确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传记研究从此成为我终生的事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阅读大量传记作品,掌握材料。前后总共花了大约十年工夫,我对这些材料进行清理和研究,写成一部

《传记文学史纲》。在这部著作中，我把世界传记文学看成一个整体，考察了十个主要国家或民族三千多年传记文学的历史，重点论析了其中几百部代表作品。这样我对研究对象就有了比较充分的把握。

另一件是研究西方文艺理论，掌握新方法。我曾听到一位著名的前辈学者介绍治学经验：要把什么学问吃透，最好的方法是给学生开这门课。于是我开设了西方文学批评方面的课程，给硕士生开了二十年的“西方文学批评专题研究”，给博士生开了八年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课程名称没有变，但我每年讲授的内容都不同，讲课的过程是我一步步深入西方文学批评的过程。为了避免现代西方文论研究中浮于表面、泛泛而谈和生吞活剥的通病，对各种流派，我不仅关注它们的理论建构，而且考察它们的批评实践。我的老师张月超教授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受老师的影响，我对莎士比亚戏剧也有浓厚的兴趣。我发现莎士比亚是一切文艺理论流派的试金石，莎剧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伟大代表，任何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只有在莎剧研究中有所建树，这一流派才能在文学批评中真正立足。于是我在研究现代西方文论的时候，特别注意它们对莎剧的解读，这样我对它们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更容易把它们融入传记理论。我发现西方古典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摹仿理论，西方的主体理论、身份理论、对话理论、叙事理论等，都是传记理论中可以参考和吸收的。我还指导了九篇研究传记的博士论文和几篇硕士论文，带领他们编写了一部《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9）》和一部《外国传记鉴赏辞典》，指导他们写作的过程同样是我深化对传记认知的过程。我还为自己喜爱的英国诗人雪莱写了一部《雪莱传》，得到了对传记的感性认识。

在有了比较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我完成了一部《现代传记学》，这也花了我十多年的时间。我的传记理论包括本体论、范畴论和书写论三个部分，我试图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传记理论体系。每当我看着这七十多万字、厚厚的一部书，心中会升起许多感慨。传记是一个古老的文类，正在焕发青春。我在

传记领域所做的工作,也只是第一步,其中有许多缺陷、不足和遗憾。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包括我的学生,正在传记研究的领域崭露头角,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多、更好。但是我也感到庆幸:当学术的发展使传记研究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的时候,我选择了它,这是一个正确的、及时的选择。

同样使我感到庆幸的是,现在我又有机会来到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我的事业,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我觉得,在交大这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进行这项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任何学科都是人的创造,传记则是人的历史。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不同学科的学者越来越注意到传记,把本领域代表人物的成就同他们的经历联系起来考察,传记已经成为任何学科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英国当代物理学家霍金在他的名著《时间简史》中就包含了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三位物理学家的传记。一些自然科学家、工程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在读者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传记和传记研究不但进入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核心领域,而且它也在更高的层次上推动着各种学科的发展,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工具理性在物质活动中或许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也只有伴随着人文关怀,它才会具有更强大的力量。传记是人生和人性的记录,传记是人类精神的纽带,在人类盼望着和谐共存的今天,世界需要传记;我也相信,交大这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同样需要传记。我当继续努力。

2013 年

理论与方法

自传死亡了吗？

——关于英美学术界的一场争论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著名传记家詹姆斯·劳里·克利福德不辞辛劳，把过去四百年的西方传记理论论著筛选一遍，选编出一本只不过 256 页的《传记艺术批评文选(1560—1960)》，做完这项工作，他非常失望地说：“同诗歌、小说和戏剧不一样，传记从来不是进行认真的批评研究的对象。”^①西方许多批评家也持有与克利福德相似的观点，传记研究可以说是文学研究范围内最落后的一个分支。

到了九十年代，其间虽然不过三十年，这一现象却有了根本的改观。一位美国的自传研究者收集了一些数字以后得意地宣称：对传记，主要是对自传的研究已经“从文学研究的边缘进入了主流”，所出版的论著在二十五年

^① James Lowry Clifford, "Introduction," *Biography as an Art: Selected Criticism 1560-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ix.

中增加了 2 500%。^① 不但是研究论著成倍增加,而且文艺批评界的一批著名人物,如法国的德里达、加拿大的弗莱、美国的保罗·德·曼等人,也开始关注自传问题。“新批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中曾占据过显赫的地位,新批评把诗歌看作文艺的最高形式、予以最大的注意,一位研究者评论说:“现在自传所占据的位置就如同新批评盛期诗歌所占据的位置。”^② 自传研究已经成为当前英美乃至西方文艺批评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但是尽管进行了大量研究,却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特别是在“自传是什么”、“哪些作品属于自传”这样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过去三十年中,自传“是争论最多的文类之一,其定义和范围一直不断被重新确定”。^③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学术界关于自传曾经有过几个重要的、有广泛影响的定义,比如德国学者乔奇·米希认为“只能概括‘自传’一词的含义来给它定义——由一个人自己(auto-)来描述(graphy)此人的一生(bio)”^④,这是从字面作出的解释,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定义。美国学者阿伯特·E. 斯通关于自传的定义是:“对一个人的一生,或者一生中有意义的部分的回顾性的叙述,由其本人写作并公开表明其意图:真实地讲述他或她公众的和私人的经历故事。”^⑤ 我们看到,这个定义已经比较复杂,对自传的内涵作了种种限定。在各种定义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法国学者菲利浦·勒居恩所下的:“由一个真实的人,关于自己的存在所写作的回顾性的散文叙述,重点在于他的

① Joseph Hogan, “Life Writing Canon and Traditions,” *Auto/Biography Studies*, Vol. 9, No. Fall, 1994, p. 163.

② Robit Folkenflik, ed., “Introduction,” *The Culture of Autobiography: Construction of Self-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

③ Jerzy Durczak, “Introduction,” *Selves Between Cultures: Contemporary American Bicultural Autobiography*,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Scholars Publications, 1999, p. 1.

④ Georg Misch, *A History of Autobiography in Antiqu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5.

⑤ Albert E. Stone, “Autobiography and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Study*, 12(1972), p. 24.

个人生活，特别是他的人格的故事。”^①勒居恩的这一定义，同斯通的定义一样，都突出了自传的故事性，这是人们所发现的现代自传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也因此带来了种种争论。

既然自传要求“真实”，自传又具有故事性，这两者能够同一起来吗？一些学者认为，既然在讲故事，真实性就难以保证，而且上述所有这些定义都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何确定自传的真实性？怎么能断定一部作品是自传而不是小说？他们认为，故事化的写作方式，使自传同小说无法区分开来；反过来说，任何小说中也都有自传的成分，自传不过是小说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某一类小说可以称为自传。如有学者就把霍桑的《红字》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历来公认是小说的作品列为自传。^②还有人更进一步，认为各种写作形式，都包含自传的成分，都可看作自传：“对一位读者来说，是自传，对另一位读者来说，是历史或哲学、心理学或抒情诗、社会学或形而上学。”^③

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反对自传作为一种文类存在的理由，不承认自传是一种独立的文类。这些说法可以统称为“自传死亡”论。

应当说，对自传作为文类的怀疑首先是因为自传本身发生了某些变化。在二十世纪，自传中所谓“故事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那种编年式的叙事方法很少再为人所用，越来越多的作者采用“场面”的方法自叙生平，在采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作者需要对自己的经历经过筛选，把他认为最有意义的部分保留下来，同时还要剔除大量内容，对留存的内容还要经过种种加工、修饰以至补充。也有一些自传文本，作者出于各种理由，通过种种方法，在叙述中或者故意模棱两可，或者有意无意地掩盖以至歪曲某些事实的真相。最

① Philippe Lejeun, *On Autobiography*, edited by Paul John Eaki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 4.

② Willian C. Spengemann, *The Form of Autobiogra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2.

③ James Olney, ed., *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5.

近三四十年出现的所谓“后现代”的自传文本,作者在自我的经历之外,还加上其他种种内容,如调侃、戏拟、反讽、自嘲等,显示出复杂的、杂糅的特征,一些学者称之为“嘲讽性自传”、“先锋自传”等,这类作品同传统的自传相距甚远,同现代或后现代小说则很难区分。

否定自传文类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传记和自传理论研究的深化。我们可以看到,七十年代以来,长期处于孤立状态的英美传记和自传研究出现了新的面目,二十世纪的一些新理论流派开始关心自传问题,正是这些理论新潮向自传研究发起了挑战,它们给传记理论家提出了难题,也在推动着传记理论的发展。我们在本文中着重考察这些理论方面的问题。

二

自传的基础是作者对自我经历的回忆,或者说,自传的主体是自我回忆的记录。二十世纪西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对记忆(包括回忆、认知等)以及与之有关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叙述活动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对自传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些传记理论家早就对回忆的可靠性表示了怀疑。法兰西学院院士安德烈·莫洛亚是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传记家和传记理论家之一,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所作的著名讲演《传记面面观》是西方第一部现代传记理论著作,其中专门用一章讲了自传问题。莫洛亚敏锐地发现了自传同他传本质的区别,指出自传的内容可能不准确或者有错误,这里有六种原因:

1. 遗忘。比如歌德和托尔斯泰对自己童年的回忆都是一些小事夹杂着一些感情和联想。这证明记忆并不可靠。
2. 作者出于美学的目的,有意删改内容。
3. 记忆出于本能的审查过程,对不愉快的事情,对不想记住的事情会进

行修正，逐渐会用想象性的记忆代替实际过程。

4. 羞愧感，比如很少有人敢真实地谈性生活。

5. 记忆是理性的，它在事件以后制造了感情和观念，找出行动的原因，但实际上人们的行为最初常常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

6. 出于保护同伴的愿望，即使准备说出自己的真相，但也感到无权说出别人的真相。

莫洛亚说的这六种情形，包括了自传作者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对自身经历的修改，后一种情形关系到记忆的可靠性问题。莫洛亚 1928 年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主要是依据观察和猜测，并没有多少理论的支持，而现在，一些学者重新注意到莫洛亚的看法，并力图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找到根据。

精神分析心理学常常被这些理论家所引用。弗洛伊德在医治精神病患者的时候发现过一些心理现象，证明记忆是不可靠的。比如心理系统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有所谓“记忆屏障”的功能，即对那些否定性的记忆进行压制，遗忘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让它长久停留在记忆之中。弗洛伊德还发现，许多心理现象，如哀悼作业、强迫症、歇斯底里症、强迫性重复动作、移情等，都是生活经验的重复（一般说来，是一种创伤或一种失败），它们带有一种意图（一般是有意识的，虽然不是必然的）：控制那种经验并指定其意义。一些学者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记忆活动是如此，自传回忆也有着类似的过程，“因为自传显然是从记忆而来的材料的扩大了描述，对记忆的编辑和赋形是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对记忆的描述相似”^①，日常生活中记忆的不可靠造成了自传的不可靠。

莫洛亚说过：“记忆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它把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对生活的回忆改造成一件艺术作品。”^②一些当代学者与莫洛亚持相同观点，认为

① Tom Smith, "Autobiography in Fresh Contexts," *Auto/Biography Studies*, Vol. 13, No. 1, Spring 1988, p. 1.

② André Maurois, *Aspects of B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p. 142.

记忆同历史事实并不是同一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结果,“你开始写作的第一分钟……你就想写得好……写得好是一种同真实没有一点关系的活动”,记忆是“我们设计出来,保护自己离开真相的东西”。^① 在记忆的过程中,为了达到记住的目的,人们总是对事实进行加工,把那些自己看来似乎是不重要、没有意义的材料舍弃掉,保留个别的、可以联系起来和构成因果关系材料,也就是把事实“故事化”或“因果化”。这样,人们所记忆下来的东西并不符合本真;同时由于人们的立场和利益的不同,认识事物的方法和视点的差异,对于同一件事,也完全可能有不同的记忆。

因此,自传家不仅仅是在写作自传的过程中,根据记忆进行虚构,而且记忆本身就是在不意识中完成了的一种虚构,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记忆并不是文本形成过程中必须修饰、组织和描述的原材料,它们本身就已经是文本,是经过组织、选择和意义化的结果,并且具有(内部的)可以看到的描述。记忆的形成已经是理解的手段,人们所认定的自己一生的意义决定了意识的记忆所具有的内容和形式。因此,记忆已经是虚构的作品……进行虚构的不只是文学家,虚构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活动,必然存在于自我或身份的形成之中,当然这并不是说,笔录的或口述的自传仅仅是记忆的自传性的复写,在把记忆改造为文本的过程中,有进一步的曲解、审查和组织活动,对美学效果的考虑也在发挥着作用。”^②

记忆具有虚构性,这已经成为一些理论家的共识。1998年美国《自传/传记研究》春季号是一个“自传与神经科学”的特辑,专门讨论自传与记忆的关系问题,汤姆·史密斯教授在主导性的论文中采用了类似的观点:“这就是说,它(记忆)有自己的造型力量,在它的变化力面前我们都是无能为力的……如果说记忆在成为文本之前就是一种想象性的重构,那么自传作者

① Frank Kermode, "Memory and Autobiography," *RARITAN*, 15(1995), p. 37, 42.

② Jane Marie Todd, *Autobiography in Freud and Derrida*, New York: Garland Pub., 1990, p. 50.

从记忆得到的材料已经以他们无法意识的方式成型了。如果是这样，对记忆进行选择、赋形为自传就是第二位的工作，思想和意愿对材料的运用，在其进入意识之前就已经形成……记忆可以根据自传作者的需要出现，不过在写作之前或之后，对同样的经验会出现不同的记忆。”^①

按照这些学者的意见，记忆不是历史的本真，而是在一定的形境影响下对历史的重建，因为在记忆的过程中，选择和赋形的能力已经在发挥作用。自传家在写作时对记忆又作了进一步的组织和加工，这样自传就更加远离了本真，或者就如柏拉图的名言：“影子的影子，同真理隔着三层。”

三

神话—原型批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界有重大影响，这一学派也在逐步扩大自己的领域，向自传和传记理论渗透。按照其原理，原始人类的思维会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一代代遗传，形成历史的积淀，制约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四季的交替、昼夜的变更孕育了原始人类最早的神话，各种文学作品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源泉。原型即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它会在后世一代代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文学是“移位的神话”，或者说集体无意识的回声。按照神话—原型批评的这些原理，自传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传主就同其他各种文学形式中的人物一样，不过是古老的原型穿上了时代的服装。否定自传文类的存在是神话—原型学派必然得出的结论。

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弗莱在他的名著《批评的剖析》中就没有给自传留下独立的位置。从古代开始的西方批评传统是把文学分为三类：史

① Tom Smith, "Autobiography in Fresh Contexts," *Auto/Biography Studies*, Vol. 13, No. 1, Spring 1988, p. 2.